

编者按

六月，杨梅红了，高考、中考结伴而至。仿佛，每年伴随着杨梅的成熟，莘莘学子的努力成果也将迎来一次检验。“考试季”凝聚了太多的汗水、喜悦和沮丧，自然也引发人们对于学习与考试、知识与命运、努力与机遇、教育体制与社会发展的诸多联想。

我国于1977年恢复高等院校面向社会考试招生，1979年推出“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等5种特定的教育形式。上世纪80年代，“自考”又加入这一行列。经历十年“文革”，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用知识改变自身命运，“五大”和“自考”的应运而生，给更多有为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与全日制高等院校学生相比，“五大生”尤其是就读于“没有围墙的大学”的“自考生”，自学成才之路走得尤为艰辛。然而，40多年来，他们与改革开放相伴同行，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在这个令众多学子及其父母心潮起伏的“考试季”“毕业季”，来听听当年“五大生”和“自考生”的故事吧。从他们的经历中，你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启迪和激励。

复旦首届自考亲历记

汪章海

“500多位同志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我们复旦大学毕业证书，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这在复旦大学8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同志们几年来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取得了可喜成果；它说明，我校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多层次人才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1985年8月10日上午，当我坐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聆听著名物理学家、时任校长谢希德教授在毕业典礼上所作的《学以致用，促进四化》致辞，看到主席台上就座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时任上海市委常委陈铁迪、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家桢等领导，作为复旦大学首届自考毕业生，心里无比激动。

两年半时间，900多天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的紧张生活，至今历历在目。

报名自考

我于1983年初和海军东海舰队宣传部其他7位战友一起，参加由上海复旦大学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专修科”首届自学考试。这是当年上海市最早开设的二十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之一。

已经30多岁、入伍15年的老兵，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自考？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军队建设面临的新任务，迫切需要自己提高和增长适应各方面新发展新要求的能力，尤其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一大批知识青年通过刻苦努力，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开始了新的人生，而我作为一名遭受“文革”冲击的“老三届”，一直怀揣着一个“大学梦”。当时东海舰队宣传部参加自考的8位同志，入伍前有的是上海杨浦中学高三学生，有的是宁波一中高三学生，而我在宁波望春中学读完初二后，当过农民和工人。当得知复旦大学开设自学考试，我马上报名，去上海参加考试。

复旦大学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专修科”自学考试，共设置16门课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大学语文”“写作”“逻辑学”等11门属必考课，另有“法学概论”“管理科学概要”“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5门为选考课。想要取得文凭，必须修满必考和选考共计13门课程。

我清楚地记得，考生报考每门课程需缴纳1元钱报名费，复旦大学自考办将考生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考试课程、考试日期、考试地点等内容，填写在统一印制的“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座位号内。考试时，考生拿着准考证和座位号进入考场，一人一张桌子，对号入座，监考老师在考场内不停地来回巡视，考场一片肃静。

事后据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统计，1983年5月第一次本科自考，共有6700余人参加，最后完成全部考试，修满所需学分，拿到毕业文凭的只有530人，获取文凭并非易事。

用心自学

年龄偏大，记忆力减退，是多数自考生面临的现实困难，但是这些人读书的优势是理解能力强，学习目的性明确。我们东海舰队宣传部参加自考的8位同志有7位是团级以上干部，大学文凭对大家来说并无实际意义，大家参加自考的目的，就是为了紧跟时代步伐，丰富充实自己，为部队建设做贡献。所以即使远离上海，无法接受面对面辅导，也不畏难退缩，全靠自己刻苦自学参加一门门课程的考试。譬如“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主编，全国12所高校共计19位教授、副教授参加编写，内容涵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代、现当代及外国文学作品共计106篇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要读懂、记牢书中全部内容，难度很大。然而读着《采薇》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滕王阁序》



本文作者领取自考毕业证书后在复旦大学校门前留影。



历年自考考试证（作者供图）

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气歌》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等千古名句，我们不但领略到汉语优美的词藻、瑰丽的意境，还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13日下午考《写作》，在3个小时的答题中，除了回答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外，还要完成两篇作文。一篇是根据唐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读后感。另一篇为漫画题：有个人拿着铁锹在地里挖井找水，快要挖到水源时，却认为这里的地底下没水，放弃不挖，拿着铁锹走开了。要求根据这幅漫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由于在学习“大学语文”时背诵过王维的这首《山居秋暝》，并依据注释做过练习题，所以写得比较顺利；按照漫画写作文那就更不难了，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写作”课考试的全部内容，最后得了75分。

工作与学习

自学考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作与学习的矛盾。当时我在东海舰队宣传部任宣传科长，在两年半的自考期间，参加了海军宣传部在井冈山舰进行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试点工作；组织舰队部队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的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军人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完成日常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要做到工作与学习两不误，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挤出时间自学。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把本学期的几本教科书带在身上，利用饭后睡前、乘车坐船、午休、节假日等点滴时间，抓紧学习。

1983年5月15日，我第一次去复旦大学参加自考，头天上午还在潜艇部队总结254潜艇开展形势任务试点教育取得的经验，下午回到舰队机关后，连夜到江北岸外滩客运码头乘坐“工农兵3号”轮船赴沪，第二天一早从十六铺码头直接赶到位于邯郸路220号的复旦大学第二教学楼考场，参加上下午各一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大学语文”考试。这样的经历在5个学期的自考中不止一次地重现过，令我终生难忘。

我们舰队宣传部参加自考的同志都已成家，处理好个人家务事与读书学习的关系，是遇到的又一个实际矛盾。那段时间我们8人中有4人家属随军在部队驻地，为了能集中精力读书，在家吃完晚饭后，参加自考的战友又主动回到办公室自学，到深夜才回家，看护孩子等家务事全部交给了家属。我的家住在宁波，尽管部队每逢星期六都有从东钱湖直达市区的班车，但为了保证学习时间，我一般不太回家。一天，出生不久的小孩忽然半夜里发烧，家属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第一医院儿科看急症，医生关切地询问“小孩的父亲为何没一起陪来”，家属如实相告：在部队当兵。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让我们安心参加自考，家人确实付出了许多。

由于各人文化基础不同，面对自学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采取了集体攻关、互帮互学的解决办法。例如“大学语文”，有些古文晦涩难懂，我们8个人你攻这一篇，我攻那一篇，然后一起交流心得；“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课程中，计算地球同步卫星高度等内容，对学历较低的同志来说，学起来有些困难，他们放下架子，一遍又一遍地向部里的大学生请教，直到弄懂为止。

边学边用

自学考试对我们这代人改善知识结构，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得《写作教程》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宁波人的。1980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说的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24岁共产党员范熊熊，因揭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招工问题上弄虚作假，受到多方面压力，跳海自杀一事。当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分别以“斗争”和“无私无畏”立论，发表了题为“学习范熊熊的斗争精神”和“像范熊熊那样无私无畏”的评论，另有媒体则以“‘美’言伤人”为题，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论述，这些写作技巧令我深受启发，对日后做好本职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记得在舰队召开的有各基地政治部主任和直属支队、大队政委参加的“四有”教育经验交流、理论研讨会上，由我们科负责为舰队政委撰写讲话稿，为期三天的会议开始后，因政委临时下部队改由聂奎聚司令员来讲话。两位首长身份不同，讲话的角度和内容也应有所区别，我根据教科书中学到的立意和选材、思路和结构、语言和文风等知识，对讲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得到司令员的首肯后，用一天一夜时间和科里的徐宝根干事一起重写一篇讲稿。聂司令员在会上的讲话，受到与会领导的一致好评，并被海军宣传部用简报形式加按语转发，充分肯定聂司令员提出的“把‘四有’教育作为总体工程，发动政治、军事、后勤业务干部齐抓共管”等意见。

努力终有回报。1985年5月11日、18日、19日3个下午考完“世界近代史”“自然科学基础知识”“马列著作选读”等最后三门课程后，8月6日我收到了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寄来的通知：“兹定于8月10日（星期六）上午8时，在本校大礼堂举行我校自学考试首届毕业典礼，请您准时出席。”那一刻，我心中泛起一层层激动的涟漪——两年半时间，5个学期，每个学期2至3门课程，共计13门课程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专修科”的严格考试，全都一次性通过，修满毕业所需全部72个学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的刻苦在职自学终于有了收获。530名首届毕业生，平均成绩80分以上的19人中，我们东海舰队宣传部占了2个；东海舰队宣传部被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誉为“自学成才代表”“知识迅速转化为能力，开创宣传工作新局面的典型”。东海舰队宣传部部长万九如作为复旦自考生，应邀在首届自考毕业典礼上作了《我们是怎样坚持在职自学的》经验介绍；我有幸受部里委派，和另一位战友一起到复旦大学领取毕业证书，见证这一难忘时刻，并在学校大门口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

（本文作者系原宁波市贸易局副局长）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文作者在塑机总厂负责职工文化技术培训，其间利用夜晚和周末时间完成了业余大学中文专业全部课程。（作者供图）

人生总会有那么些节点，它彻底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轨迹，而那一刻，那些片段，会长久地镌刻在你的记忆里。

1984年仲夏。离宁波市人事局发出商调函已过去一个多月，我的那份调函仍被压在二轻局人事处。据说，局里通知我厂人事科去拿调函，几天后，我厂的书记去局里开会，把调函扔了回去，并撵下一句话：人是工厂培养的，怎能想要就要？

那年春天，复刊后的宁波日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编人员，几百位应聘者经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最后敲定录用27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所在的工厂是局属机械行业的“老大”，工厂书记与局长私交甚笃，于是，书记根本没把局里的人事处当作一回事。

那个年代，档案是人的“身份证”，调函调不出存在企业档案室里的“身份证”，人就动弹不得。事情就这么僵住了。

这期间，厂领导对此事缄口不提，也不找我谈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尽管报社已两次来到厂里阅档政审。

日子在静静地流逝，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等待。

终于，我鼓起勇气去找书记。他劝我安心工作，说调出一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无望中，我又硬着头皮去局里找局长。

至今，我仍记得他冷冷的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儿，连话都难以说上几句。

这期间，厂里将我这个工人出身的技术员，从职工培训部门急调到厂办担任负责人，摆开了与报社要人对抗的架势。

在宁波日报的招聘录取名单中，与我同样境遇的，还有几位：

H君，老三届，纺织局下面一家著名纱厂任教，我“业大”中文班的校友。她的文字基础和文学功底很扎实。在市总工会“文革”后兴办的业余大学，有许多老三届学习尖子，或因家庭成分不好，或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掣肘，没有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H君当属其中一位。若干年之后，她从记者被提升为报社副刊部主任、市女记者协会主席。

S君，老三届，来自纺织局下属最大的一家企业。他原在遥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工作，在那里修完大学课程。这次招聘的几百位应试者中，他笔试成绩名列第一。若干年之后，他成为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

L君，市内一家印刷厂的美工，小我两岁，我们都够不着“老三届”。若干年后，他在报社从事美编工作的同时，深耕艺海，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当选市美协名誉主席，成为国内水彩画界极具盛名的画家。

眼看二十几位录取者先后到报社上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焦虑而无助。

这期间，我们抽空会去报社打听调动的进展。当时的宁波日报社位于厂堂街12号，毗邻市政府大院后门，是一幢旧式洋楼。报社门卫隔壁有间小屋，是这次招聘的接待室。负责接待的杨顺福老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待人热情，善解人意。此时，报社的招聘工作已告完成，我们这些应聘者虽被录用，但如果原单位坚持不放手，他也爱莫能助。可杨老师觉得这事还有争取的余地。他告诉我们，“文革”后复刊的报社缺人，这次全市范围内招聘采编人员，是市委决定的，原则上要求原单位不能阻拦。

关键时机的关键信息。我们决定给市委写信。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相约来到报社，来到那间小屋。此时招聘已结束，人员刚撤离，没开灯光的屋子灰暗而闷热，门边靠窗位置还摆着一张桌子。就着桌子，S君坐下执笔。他似乎已腹有成稿，边写边念，我们仨你一言我一语在一旁凑合着。L君子个子很高，站在S君的身后；我在左侧倚门而立；H君在我的对面，她总是笑呵呵的，平和而幽默，再急的事到了她那里似乎也会舒缓下来。

如今已完全记不得信的内容，大致就几层意思：一是希望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二是原单位不放手不符合新形势下人才流动的改革方向；三是立志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之类的“决心”。

S君书写严谨，字迹端正秀美，他边写边归纳着我们几个人的插话，信文一气呵成。须臾间，我感到了与高手间

楼毅

一九八四，那个仲夏的下午

的差距。后来，我们分在一个部室工作，那种由学养落差形成的压力，继而转化为催人上进的动力，与他，是人生的一次幸遇。

我们四人从未写过此类上访信件，对结果完全没有底。莽撞而心不甘，抗一次天命、尽一次人事，大家郑重地在落款处签了字。

信是写给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的。

那个年代，人员的单位所有制还没破戒，人才流动尚处于口号阶段。现今再正不过的“工作调动”“跳槽”，在当时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

一星期后，我惊喜地接到市人事局通知，说可以直接去报社报到了。据说葛书记对那封信迅速作出批示，信件随即转发到市人事局、报社及“卡”人单位的上级各局。

至今尚不清楚这位地方最高长官的批语内容，反正没有档案可先去党报上班，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几天后，厂长把我叫去。他说，“卡”已经没意义了，我们放人。

就这样，我和另三位同仁经过一番波折，先后进入宁波日报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据说哈佛大学有个调查：人的一生活通常会由七次决定人生走向的机会，但上天在赐予我们这些机会时，总会设置一些门槛，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跨越，这些机会就会一溜而走。

我想，每个时代赐予人们的机会未必均等，但机会始终垂青于有准备者，无论你是执意，或是无意间完成了这种准备。

至今，充满蓬勃生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对这个度过青春最好时光的工厂心怀感激从未抱怨。在那里，一个十六岁进厂当学徒的车床工，一个因为家庭成分连上初中资格也差点被剥夺、更无缘高考的“可教子女”，被推送读完“七·二一”工大机械专业；在那里，一个实际文化程度仅小学四年级（当年“文革”爆发）的初中生，有机会完成了业余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

岁月未曾蹉跎，是因为你在肃杀的冬季有个蛰居孕育的庇所，直到迎来春天。

而完全是因了“业大”四年夜以继日的寒窗苦读，让我们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转型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在“文革”后的人才断层期，在众多揣着梦想试图改变命运的应试者中，我们幸运地“存活”下来；又在后来高负荷的岗位上，有了砥砺前行、勤勉担当的承受力。也正因此，在那个彷徨无奈的下午，有了付诸申诉的底气 and 信念。

我们四人的生人轨迹，在那个仲夏的下午被改变了。（本文作者系宁波日报社原资深编辑）